

深切怀念吴征镒老师

胡嘉琪

(1932~)，复旦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

我没有聆听过吴先生的讲课，也不是吴先生的研究生，但在吴先生指导下一起工作和学术交往，持续的时间比我的导师曲仲湘、胡步老（先骕）还长。光阴荏苒，岁月如梭，断断续续地走过了半个多世纪。他的言传身教、关心、支持和帮助，使我终身受益。许多往事虽不能精准记住，但一些印象较深的经历，至今记忆犹新。

初次见面，给定了个“植物”学名

新中国成立后，百废俱兴，由革命战争转入到经济建设，在当时的国际环境下，需自力更生，急需建设人才。1954年，我们复旦大学生物系高等植物专业的大四学生由焦启源教授（植物生理学家、香料专家）率领被派往广州，参加由农垦部门和中国科学院组织的华南橡胶宜林地考察。当年的高校经过1952年的院系调整，学制全面学苏联，一边倒，专业分得很细，调整后复旦生物系由几所大学合并而成，仅毕业班学生就达80多人，分成多个专业，每个专业小班人数不算多，高等植物专业全是女生。我们大三时已修过专业、专门化课程《植物分类学》《植物生态学》，学过和知道生物学分类的“林奈双名法”。吴先生是考察队的领导之一，当焦先生把我们这些学生介绍给吴先生时，他见到清一色全是女同学时，脱口而出说了“*Fudan multiflora*”，给我们定了个学名。由此，在考察队里“复旦七姐妹”就传开了，当时我们对这位“老专家”的诙谐和幽默，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后来才知道他原来是队里著名的“老教授”、专家中最年轻的一位植物分类学家。

为争取时间，和工作需要，考察队的业务小组分成海南和湛江两个小分队，同时开展工作。陈灵芝、杨澄、吴玉树、屠骊珠分在湛江队；孙鸿良、顾其敏和我分在海南队。吴先生是海南队的领队，在他的带领下，进行海南岛数月的标本采集和植被调查，我开始对吴先生有了直接的接触和了解。

学识渊博，认植物过目不忘；身体力行，关心队员无微不至

60年前的海南岛，没有现在的繁华，全岛从东到西只有一条柏油国防公路，其他道路都是碎石泥路，海南的土壤大多是红壤，考察地点转移时，所用的交通工具是敞篷吉普车，车一开动，红尘飞扬，经过几小时的路程，灰尘满头，我们三个女生都成了“金发女郎”。当时的所谓业务队员所做的工作，简单地说就是采集标本和拉样方（即在划定的一定面积，对其中所有植物进行记名、计数，描述和记载植物生长情况、生态环境、地形地貌、土壤特征等）。我们这些大学生虽然已修过植物分类学，认识不少华东地区常见植物，但对华南热带植物却有很多不认识，采标本问题不大，做样方却困难重重，晚上回来整理材料时，就拿着白天所采集的标本，和样方中遇到的样本去问吴先生，他立马一一回答，不论是有花果的，还是没花果的，植株枝叶或幼苗，绝大多数都能告知其科、属、种，经常是完整地写出它的学名；对植物的幼苗，较难辨认，我们一时分辨不清，问了又



问，而他不厌其烦告诉我们，并说你们已经采过了。我们对他的学识渊博，认植物过目不忘，无比钦佩，庆幸跟随这样一位专家一起工作，能认识大量南方植物，提高了识别植物水平。

野外工作白天很辛苦，晚上回来要整理记录，翻换压标本的草纸，遇到下雨，无处晾晒，需生火烤干，烤棚里烟雾缭绕，闷热难耐。当时海南岛，没有高楼大厦，一般都是些平房，很少见二三层的楼房，我们野外工作，住宿条件更差，大多借住草屋、临时搭建的简陋竹草棚。海南地处热带台风多发区，有一天，电闪雷鸣，瓢泼大雨，吴先生得知女生住的草屋被压垮塌了，竟冒着大雨全身淋透前去查看探望，幸好我们那时已早早起来去烤标本草纸，没在住处。这下，晚上住处成了问题，好在没人受伤，真是不幸中的万幸。吴先生那时是大队和分队的业务负责人，工作极其繁忙，还如此关心队员，身体力行，我们十分感激。

1956年春，吴玉树和我已将生态研究生论文在复旦基本完成，即将毕业，跟随导师曲仲湘教授到云南大学，与云大生物系教师朱维明等一起被派往参加中苏云南综合考察队，吴先生又是考察队的主要负责人之一，不过考察队里添了三位前苏联的植物学家，来自北方的苏联专家对南方热带植物可说比我们还陌生，他们对吴先生的精湛业务，识别植物的广泛和鉴定快速、精准，赞不绝口，说他是现今“中国的林奈”，野外考察的“活字典”等。在云南热带雨林考察和在海南同样很艰辛，堆积了厚厚的枯枝落叶的腐殖质层，使林间小路很滑，林中潮湿，有蚂蟥，它会不知不觉吸附在你身上，吸饱血后变成圆鼓鼓的小球滚掉，给吸口处留下三叉伤口，流血不止；山间的马道也很崎岖。记得有一次因路途比较远，老先生、病号和女同志可以骑马，骑云南马帮的马是侧身坐在“马蹠子”上。我们这些平原地区长大的，以前没有见过马帮，也没骑过马，没坐过马蹠子，更不知道上山时要拽住马脖子上的马鬃；下山时要拉着马尾巴，一次马从下山的道路突然改道向上山的道路猛冲，我从马屁股后面滚落下来，这可把吴先生吓坏了，“危险！要出人命的”，值得庆幸的是那条道路并非沿着悬崖绝壁，我滚掉在一堆高高芒草丛中，虽然脸上和手臂上划了许多伤痕，血迹斑斑，但无严重伤害，并无大碍。回想当时的考察队，加上担任警卫的解放军战士、苏联专家、翻译、考察队员浩浩荡荡有百人左右，吴先生既是中方的专家，又是全大队的负责人，既要陪同苏联植物学家专业考察，又要与地方领导联系和汇报，工作极其繁忙，他却始终和队员在一起，时时刻刻把每个队员的安危放在心上，实在令人感动。

治学严谨，一丝不苟，以诗代序，文学功底深厚

“文革”后，高校复课。我在复旦的教学任务，除给全系各专业的学生开《普通植物学》大班课外，专业课程仍主要的限于植物生态学方面，参加国内外学术活动，也是以生态学为主。1990年冬我从阿联酋出席盐生植物国际会议回国时，在北京出了车祸，伤筋断骨，考虑今后难以再从事植物生态学的野外调查、带学生实习等，在北京住院养伤期间，曾表示，今后可以并愿再接受一些植物志的编研工作。后来《中国植物志》编委会副主编崔鸿宾同志邀我和他合作，承担第70卷爵床科的编研任务，并签订了合作计划。回沪养伤半年后，恢复行走能力，我将过去的毕业论文的课题，继续深化扩大，集合十多年来带学生去黄山实习积累的资料，加以整理，与黄山园林局合作，编著《黄山植物》一书，以供学生野外实习和有关的园林工作者应用。完稿后请吴先生作序。吴先生十分认真，先询问书的内容，需先看过书的纲要，审查学名。经他仔仔细细地将预先打印好的详细名录审查一遍后，最后欣然应允。吴先生办事如此认真，严谨慎重，一丝不苟，使我更加钦佩。不久，我收到吴先生寄来亲笔书写的以诗代序的文稿，信中还称赞该书可“雅俗共赏”。见到他亲笔



书写的工整秀美的楷书，以植物名抒情的诗句，透出浓浓文学氛围，充分反映出吴先生不仅是杰出的科学家，还具深厚的文学功底。编辑和我都喜出望外。

重视基础理论，支持新生事物，引领发展新兴学科

“文革”期间，高校教学和科学研究工作几乎停滞，与国际先进学术水平拉大了差距。1973年“三志会议”后，恢复了《中国植物志》的编研工作，吴先生是积极组织者和领导者之一。科学院和高校有关的所、系，投入很多力量参加这一重大项目，复旦生物系也承担了任务，我也参加植物志的编研工作。1976年后，国外的新兴学科传入我国和计算机的应用和普及成了新的热点，高校师生们和科学院科学工作者都如饥似渴地学习、探索、追求，争取将过去失去的时间补回来，将拉大的差距尽量缩小。20世纪80年代学习数值分类学，电脑在生物学中的应用、尝试建立植物数据库、智能鉴定植物等，都是大家感兴趣的课题。

1986年我申请并获准“中国裸子植物汉字态数据库的设计和应用程序”项目，1990年任务完成，拟请吴先生主持成果鉴定会，但知道他很忙，那年日程已安排满，九十月间他应邀去日本讲学访问，再到海南参加国际学术会议，先生硬是百忙中，争取在顺路的情况下，挤出时间来复旦主持这次鉴定会，充分体现了老专家对新生事物的支持，对晚辈的关爱和帮助。之后，我还了解到昆明植物所在他的引领下，建起中国种子植物数据库及智能检索系统电子版；标本馆的电脑管理和检索系统等。带动了中科院各植物所开展了计算机在分类学中和标本馆现代化管理系统的应用。

无私关怀，鼎力相助，高尚的人格魅力

1995年在崔鸿宾同志催促下，我专程出差北京，与他讨论爵床科《中国植物志》编写的具体分工，逗留期间，除了开始查阅标本，并观看了他对该科植物花粉的研究所收集的样本和资料。回沪后，不到一个月，接到北京电话通知，他突然去世。编委会希望我能把该科任务全部承担下来，当时我很犹豫，因为上海地区及复旦的标本室该科标本极少，不能像拥有大标本馆的植物研究所的同事们，可随时去标本馆查看、翻阅、鉴定标本，精耕细作，仔细研究。该如何查阅大量标本呢？对我来说是个难题。吴先生找我谈话，殷切希望我能把任务接受下来，我反映了上述的具体困难，



1990年，吴老参加“中国裸子植物汉字态数据库的设计和应用程序”课题论证会



1990年10月游虎丘（左起：胡嘉琪、陈守良、段金玉、吴征镒、崔鸿宾）

他表示会设法支持。我同意接下这项任务后，几年多次轮番到南京、北京、广州和昆明的四大标本馆出差，看标本和补查资料。编委会虽将爵床科项目所余的经费全额拨给复旦，但此时我已退休，不能再另行申请经费支助。年年出差，仅车费、住宿费就使我捉襟见肘。因此出差的时间一般不能长，一般为期两周到一个多月。爵床科的新、老标本又特别多，且过去少人研究、整理，常有十几柜至几十柜。而我也不愿遗漏，因此看标本需分秒必争，简直是走马看花，甚至是跑马观花。幸好有许多同事、老同学愿腾出他们的办公室借给我晚上使用，标本馆的管理同志也很友善，同意让我把部分标本临时借出搬到办公室去，这样我就可以利用白天、晚上的时间充分利用，由8小时工作，延至12小时，大大地提高查看标本的效率。经两次出差已完成了初步鉴定，快速看了一遍，不少存疑和一时定不了名的，只好暂时撂下，留待以后进一步研究。此时吴老建议我再来昆明一次，我当时面有难色，一是交稿时间迫切，更主要的是项目经费已用完了，吴老了解实情后说“那我给你一点费用”，我听之甚喜，可解决燃眉之急。问是什么经费？从何项目拨出？回答是“用我的稿费”。这怎么能接受？！最后我婉言谢绝了。此时此刻，心中十分感激，多好的老师呀！他自己全身心奉献给科学，还无私地鼎力相助我们晚辈，反映出他崇高的人格魅力。

1990年在吴老的过问下，《云南植物志》副主编陈书坤同志帮我联系，借住在昆明植物所植化室一位女同志的宿舍里，白天除了去山上的标本馆查阅标本资料外，其他时间和晚上可以在院士办公室前阳台小间工作，实现了我第三次到昆明所出差，也是时间最长的一次。看到吴老每天8时许准时进办公室看稿、审稿或写作，直到中午回去用餐，餐后稍作休息，下午又到办公室继续工作，伏案写他那蝇头小楷，连我们都需用放大镜才能看清。虽然我已退休多年，比起耄耋之年的吴老，辛苦一点又算什么呢？这段时间为爵床科的编写，吴老和我有了许多面对面的讨论，对种、属的划分，听取了吴先生的意见，全卷总体上按照崔鸿宾同志原已定框架，未作大的变更。

2007年，我来云南大理等地旅游，提前一天，特地去昆明植物所看望吴老，这时的吴老已年过九旬，坐轮椅了！见面相互问候后，他又侃侃而谈，关于任继愈邀他编纂《中华大典·生物学典》一事。多么可崇敬和爱戴的师长啊！你一身无私奉献，鞠躬尽瘁，是永远值得我深切怀念的好老师！



2007年看望吴老夫妇

